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主办

梁景和 主编

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论丛

狂澜与潜流

——中国青年的性恋与婚姻（1966~1976）

Gender, Romance and Marriage of
Chinese Youth During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76

李秉奎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主办

梁景和 主编

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论丛

狂澜与潜流

——中国青年的性恋与婚姻（1966~1976）

Gender, Romance and Marriage of
Chinese Youth During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76

李秉奎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狂澜与潜流:中国青年的性恋与婚姻:1966~1976/李秉奎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7

(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论丛)

ISBN 978-7-5097-7544-8

I. ①狂… II. ①李… III. ①青年-性-文化研究-中国-1966~1976②青年-恋爱-文化研究-中国-1966~1976③青年-婚姻-文化研究-中国-1966~1976 IV. ①C91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07631号

·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论丛·

狂澜与潜流

——中国青年的性恋与婚姻(1966~1976)

著 者 / 李秉奎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吴 超

责任编辑 / 刘 丹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文分社(010)59367215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4.75 字 数:249千字

版 次 / 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7544-8

定 价 / 69.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编 委 会

顾 问 (按姓氏笔画排序)

刘志琴 李文海 郑师渠 耿云志 戴 逸

学术委员会主任

梁景和

学术委员会委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左玉河	吕文浩	朱汉国	孙燕京	李长莉
余华林	闵 杰	迟云飞	杨才林	杨念群
夏明方	徐永志	郭双林	梁景和	黄 东
黄兴涛	魏光奇			

主 编

梁景和

总 序

梁景和

中国改革开放这一新的历史时期到来之后，历史学与其他学科一样发生了重大变革，学术界迎来崭新的繁荣时期。中国近现代史与其他史学专业也都有了长足发展。中国近现代文化史、社会史、社会文化史犹如本专业的其他领域，亦展现着自己特有的新生魅力。20世纪80年代初期文化史的复兴，80年代中期社会史的复兴，80年代末90年代初社会文化史的兴起，这三条线索所铸成的链环与其他领域紧密结合，呈现中国近现代史的强劲发展势头。其中社会文化史研究已经走过20多年的艰辛历程。

20世纪80年代末就有学者提出文化史与社会史相互结合的问题。^①1990年有学者撰文，^②提出“社会文化史”的学科概念。1991年有学者在学术领域开始运用“社会文化史”^③的概念。1992年与2001年，在北京先后召开了“社会文化史研讨会”和“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两次学术研讨会，^④会议集中探讨了社会文化史的理论方法问题。2005年、2007年、2009年和2011年分别在青岛、乌鲁木齐、贵阳和苏州召开了4次中国近代

① 刘志琴（署名史薇）：《复兴社会史三议》，《天津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刘志琴：《社会史的复兴与史学变革——兼论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共生共荣》，《史学理论》1988年第3期。

② 李长莉：《社会文化史：历史研究的新角度》，参见赵清主编《社会问题的历史考察》，成都出版社，1992。

③ 梁景和：《辛亥革命80周年全国青年学术研讨会关于社会文化史问题的讨论述评》，《辽宁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2期。梁景和于1994年在自己博士学位论文的提要中说明本论文的“社会文化史”的属性，认为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近代中国陋俗文化嬗变研究》是“社会文化史研究范畴的一个具体领域”，参见《〈近代中国陋俗文化嬗变研究〉提要》，1994年5月，未刊稿。

④ 参见李长莉《社会文化史：一门新生学科——“社会文化史研讨会”纪要》，《社会学研究》1993年第1期；左日非：《“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综述》，《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2期。

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有相当数量的社会文化史论文发表，^① 也有关于探讨社会文化史的理论文章。^② 2009年6月和10月以及2010年4月在北京先后召开了3次“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学术研讨会”，^③ 这也是开始以社会文化命名的学术会议。

20年来，社会文化史研究形成了一些自己的特征。

首先，社会文化史的本土化特征。中国社会文化史是中国史学自身发展逻辑的产物，是中国文化史、社会史、社会文化史发展链条上的一环。改革开放的大势，催发了文化史的复兴；改革开放的深入，迎来了社会史的兴盛。文化史研究偏重于精神层面，即关注思想观念、社会意识等问题的研究。社会史研究偏重于社会层面，即关注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等问题的研究。而社会文化史研究则关注两者的共生共荣。很多文化观念问题反映在社会生活等社会问题的层面上，很多社会问题与文化观念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社會文化史就应运而生了。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社会文化史的萌发是中国史学自身发展逻辑的产物，主要研究者是顺着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而走向社会文化史领域的。

其次，理论探索的自觉。社会文化史的研究重视理论和方法的讨论，在1992年“社会文化史研讨会”和2002年“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上有很多学者展开了讨论，并发表了很多重要的理论见解。^④ 此外，刘志琴的《青史有待垦天荒——试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崛起》，^⑤ 梁景和的《关于社会文化史的几个问题》^⑥ 和《社会生活：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一

① 参见吕文浩《“近代中国的城市·乡村·民间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3期；朱浒：《晚清以降的经济与社会》，《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1期；毕苑：《第三届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1期。

② 诸如梁景和的《关于社会文化史的几个问题》，见李长莉、左玉河主编《近代中国社会与民间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③ 参见王红旗主编《中国女性文化》第12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参见梁景和主编《社会生活探索》第二辑，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④ 参见李长莉《社会文化史：一门新生学科——“社会文化史研讨会”纪要》，《社会学研究》1993年第1期；左日非：《“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综述》，《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2期。

⑤ 刘志琴：《青史有待垦天荒——试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崛起》，《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1期。

⑥ 梁景和：《关于社会文化史的几个问题》，李长莉、左玉河主编《近代中国社会与民间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个重要概念》,^① 李长莉的《社会文化史: 历史研究的新角度》^② 等都属于社会文化史探索的理论文章。

最后, 展现重要的研究成果。20 年来, 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 发表了很多学术论文,^③ 也出版了一批学术专著, 诸如刘志琴主编的三卷本《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8), 梁景和的《近代中国陋俗文化嬗变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修订本, 2009) 和《五四时期社会文化嬗变研究》(人民出版社, 2010), 李长莉的《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2) 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从传统到现代》(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8), 王笛的《街头文化: 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 (1870 ~ 1930)》(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严昌洪的《20 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史》(人民出版社, 2007), 乐正的《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 (1860 ~ 1910)》(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忻平的《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 (1927 ~ 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9), 孙燕京的《晚清社会风尚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余华林的《女性的重塑——民国城市妇女婚姻问题研究》(商务印书馆, 2009) 等, 均为重要的学术著作。^④

社会文化史发展至今, 在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 存在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 相关历史资料数量庞大, 但非常分散、芜杂、缺乏整理。相当多的研究者尚缺乏运用新视角、新理论、新方法的自觉性和

① 梁景和:《社会生活: 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河北学刊》2009 年第 3 期。

② 李长莉:《社会文化史: 历史研究的新角度》,赵清主编《社会问题的历史考察》,成都出版社,1992。

③ 关于社会文化史研究的论文参见李长莉《社会文化史的兴起》[载《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 年第 4 期];左玉河、李文平《近年来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评述》(载《教学与研究》2005 年第 3 期);苏全有等《近十年来的中国近代风俗史研究综述》(载《安阳大学学报》2004 年第 2 期);黄延敏《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新进展》(载《近代中国与文物》2009 年第 2 期)等文的介绍。

④ 重要的社会文化史学术著作还很多,诸如严昌洪的《西俗东渐记——中国近代社会风俗的演变》(湖南出版社,1991)和《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李少兵的《民国时期的西式民俗文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方平的《晚清上海的公共领域 (1895 ~ 1911)》(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德〕罗梅君的《北京的生育婚姻和丧葬: 十九世纪至当代的民间文化和上层文化》(以下简称《北京的生育婚姻和丧葬》)(王燕生等译,中华书局,2001),薛君度、刘志琴主编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等,在此不赘述。

经验积累，缺乏研究范式上的建树。缺乏深入专精的高水平著作，研究者缺乏必要的社会学和文化学的知识训练等。^① 这些都是具体的实际问题，需要学者们一点一滴地处理和一步一步地解决。

社会文化史已经走过了 20 年的历程，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我们盼望早日迎来社会文化史发展的新时期。2010 年 5 月出版的《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② 和同期召开的“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回顾与走向”座谈会，^③ 以及《光明日报》2010 年 8 月 17 日刊发的《社会文化史：史学研究的又一新路径》一文，既是对以往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一个总结，也是对社会文化史未来发展的一个期待。2010 年 9 月 25 日和 2012 年 9 月 22 日在北京分别召开了“首届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和“第二届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2011 年 9 月 24 日在北京召开了“西方新文化史与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希望通过这样的会议来推动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我们坚信，以上面几项学术事项为契机，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将会迎来崭新的发展。

社会文化史兴起之初就引起了诸多年轻学者的兴趣，如今则吸引着众多青年学者的关注，他们纷纷把社会文化史作为自己的学术向往和学术追求。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即准备编辑出版一套“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论丛”，出版该论丛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把热心研究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的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的研究论著发表出来，以促进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深入开展。现在本论丛已经陆续出版，希望其中能有优秀的研究成果问世。

2013 年 1 月 20 日修改于幽乔书屋

① 参见李长莉《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 年第 4 期；参见左日非《“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综述》，《近代史研究》2002 年第 2 期。

② 梁景和主编《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③ 毕苑：《“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回顾与走向”座谈会综述》，梁景和主编《社会生活探索》第二辑，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目 录

绪 论	1
一 问题的提出	1
二 学术史回顾	20
三 分析路径与研究资料	47
四 章节结构	53
第一章 城市青年的欲与爱	54
一 革命与性恋	56
二 红卫兵运动时期青年的性恋观念	76
三 派性武斗中的性暴力	92
四 从“拍婆子”到“恋爱潮”	102
五 小结	112
第二章 城乡青年的择偶观念与行为	114
一 阶级成分、家庭出身与择偶行为	116
二 由农村向城市的婚嫁流向	128
三 职业声望与择偶偏好	133
四 小结	140
第三章 农村青年的彩礼与婚礼	142
一 彩礼：婚姻支付中的财物流动	143
二 婚礼仪式中的“家”“国”象征	152
三 小结	160

第四章 知青的“婚”与“不婚”	161
一 “晚婚”与“不婚”	162
二 “扎根”婚	169
三 遇罗锦离婚案及其引发的讨论	176
四 小结	180
余 论	181
一	181
二	182
三	184
附录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贯彻婚姻法运动的历史考察	186
附录二 “无选之选”	
——评《农民的择偶形态：对西北赵村的实证研究》	196
参考文献	204
后 记	218

绪 论

一 问题的提出

中国的1966~1976年，注定是值得后世永远铭记的十年。1966年的邢台地震和1976年的唐山地震，自然界以“惊天动地”的形式标明这十年的到来和离去都不同寻常。在此不同寻常的十年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化大革命”或“文革”）给此后的中国带来至深至巨的影响。^①或许随着“文革”的渐行渐远，这种影响反而会日益彰显。

探索“文革”十年对此后中国产生的深远影响，学术界往往将着眼点聚焦于政治运动的涨落起伏及其带来的“上台/下台”“得势/失势”连带效应。如果观察“文革”仅仅以此为界而画地为牢，显然无法展现此间的飓风狂澜、波谲云诡。十年间人们私密生活领域对政治运动的迎拒向背，同样应

① 有一种观点认为，“文革”以极“左”的错误方式证明“此路不通”，由此催生了改革开放的到来。比如，胡绳在1988年的一次会议上指出：毛泽东是一心想中国富强，“问题是他过分相信了革命可以解决一切。不断革命，继续革命，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这条路走到了尽头。如果没有‘文革’，中国的改革不可能来得这么快，这也许是‘文革’的一点‘历史意义’吧？”[参见罗荣兴、谷嘉旺、曹焕荣《一个民族在这里沉思——访人大、政协会上的三代知识分子（之二）》，1988年4月7日第3版《人民日报》]值得注意的是，曾任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的王力，在1993年出版的回忆录中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说：“中国‘文化大革命’把极‘左’错误推向极端，就必要走向反面，自己否定了自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新历程，是符合客观发展规律的，是符合历史潮流的。”“毛泽东探索和试验的成功和失败，都是宝贵遗产。失败是成功之母，如果中国没有过去那么大的失败，也许不会有今天这么大的成功”（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第VIII页）。由此可以看出，有不少人接受或赞成“不搞‘文革’就不会改革”的观点。但是也有学者指出，类似观点虽然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是缺乏严密的逻辑性，更不能由此推论出“‘文革’和改革之间的关系不但是必然的，而且是普世的”（参见Hao Jian edited, *In Memory of the CR: Minutes of the Symposium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eijing, 2006, Texas: Fellows Press of America, Inc, 2006, p. 44）。

该给予高度关注。与光怪陆离、斑斓杂错的政治生活相比，在“文革”这个特殊的时间段，普通中国人的私密生活看起来似乎显得“黯淡无光”甚至“微不足道”，这些内容常常难以走进严肃学术研究者的视野。

然而，正如孔子所说，“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可以说，社会习俗的变与不变、何以变与何以不变，都折射出整个时代的光芒。钱穆的治史经验是，研究一个国家或民族在某一时期的历史，最要者“当上察其政治，下究其社会”。^①“上察政治”，可知“社会”之变迁；下察“社会”，可知“政治”之善苛。本来，二者是难以完全分割并具有互动相应关系的。如果仅关注政治生活领域的风云变幻而割裂它与社会生活的联系，恐怕只能是“抽刀断水”之举，其结论势必难以契合历史现场及时代真实。就“文革”时期而言，青年人的恋爱、婚姻观念与行为确实潜然发生重要变化，这些变化自然和政治生活领域的沉浮起落密切相关，但是和政治生活领域的异常喧闹有所不同。从某种角度而言，日常社会生活领域产生难以阻遏的“革命”，足可折射出旧时代的逝去和新时代的到来。随着人们对“文革”十年的深入反思，恐怕研究者不能无视这十年间中国日常生活领域发生的“静悄悄的革命”。

纵观十年间政治运动的风云变幻，最引人注意的社会群体至少应该包括时而站在潮头时而被边缘化的青年人。质而言之，青年群体在“文化大革命”的“运动群众”与“群众运动”中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大致可以讲，“文革”以运动青年发动“革命”开始，却以青年运动反对“革命”结束。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象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② 1957年11月，毛泽东第二次访问苏联，在莫斯科大学会见中国留学生时做出上述内容的讲话。在1966～1975年，这则谈话被广为引用，除各种文章的引用之外，这则谈话仅仅作“毛主席语录”，被《人民日报》登载在报首重要位置就至少有十次。^③ 这从一个侧面或可说明，青年群体在

①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三联书店，2001，第38页。

② 《毛主席会见留苏学生》，1957年11月20日第1版《人民日报》。

③ 参见《人民日报》（图文电子版）1966年8月24日第1版，1966年11月22日第1版，1967年3月3日第1版，1967年3月27日第1版，1970年8月18日第1版，1973年1月22日第1版，1973年1月31日第1版，1973年2月22日第1版，1973年4月4日第1版，1975年10月18日第1版。

“文革”的政治运动中占有重要席位。

同样是在天安门广场，从受到毛泽东八次接见到主动参加“四五运动”，部分青年实现了从支持“文革”到批判“文革”的180度大转身。1981年，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邓力群，曾在一次重要的谈话中提到：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但最后互相冲突的结果，却跟原来的想法有的完全相反，有的有很大不同。“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红卫兵，东冲西冲，大多数人是出于对党的热爱，出于对毛泽东同志的信赖。可是运动的发展跟他们原来的想法，跟相当大一部分人的想法不一样，于是有的变成了逍遥派。以至于到天安门事件，起来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相当多的人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红卫兵。这个行动同他们刚开始参加“文化大革命”时候的想法，是一样的吗？而这种不一样，是他们自己原来就打定主意，想着先参加以后再反对吗？不是。这是斗争的反覆过程中间引起互相冲突，引起思想的变化，受到事实的教育才变过来的。^①

通观上述内容可以知道，这篇谈话的主旨在于强调“文革”的“否定之否定”，即它以“试错”的方式证明“此路不通”。客观地说，将“文革”初期的红卫兵运动与末期的“四五运动”打通并联系起来，对于认识该时期的政治运动和该时期的青年群体，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启发意义。无独有偶，几年后，部分研究者同样也提到：“文革”时期的青年群体，“曾是极‘左’理论狂热而虔诚的信仰者，以红卫兵运动的方式率先卷入“十年动乱”；他们也曾是那场噩梦最早的醒悟者之一，在天安门广场发出了‘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呐喊”^②。

为什么青年群体会在“文革”时期发生这样大的变化？是什么原因使得他们成为“那场噩梦最早的醒悟者之一”？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文革”的结束，距今将近40年的时间。被称为“文革之子”的这一代人，现在多数已经到了“知天命”或“耳顺”的年龄，他们看待当年历

① 邓力群：《介绍和答问——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北京出版社，1981，第93～94页。

② 参见唐灿、米鹤都、陆建华、印红标《思考一代的自我反思：一项关于红卫兵及其同代人的思想轨迹的研究》，《青年研究》1986年第11期。

史的心态已有不同程度的客观与平和。^① 在 20 世纪的后半期，他们先后扮演过重要的角色：曾经是“50 年代的少先队，60 年代的红卫兵，70 年代的知识青年，80 年代的中青年”。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到 21 世纪前十年，他们中的许多人又成为影响时代前进方向的政治家、思想家、企业家和各行各业的骨干。有人甚至认为，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这些人是“实现中国跨世纪过渡的一代人，掌握中国未来命运的一代人”^②。虽然这种看法好似带有“精英主义”的色彩，但是从特定角度来看，他们许多人扮演的角色的确带有浓重的时代色彩。

《孟子·万章章句下》言：“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其要意在于提醒人们注意，了解诗、书的真意必要先深入认识作者其人，而了解作者必要先研究他们所生活的时代背景。同样的道理，从学术意义上研究某一社会群体，必须先了解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社会环境。只有如此，人们才能进而加深对他们所处社会和时代的认识。与此同理，梁启超认为：

人类于横的方面为社会的生活，于纵的方面为时代的生活。苟离却社会与时代，而凭空以观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人之思想动作，则必多不可了解者。未了解而轻下批评，未有不错误也。^③

“文革之子”这一代人，在对自己历史命运进行深度思考的同时，也不断地对于国家与民族“为何有此一劫”而提出反思。在为数不多的研究者

① 2013 年 6 月，原任山东济南市文化局文物处处长的刘伯勤，在《炎黄春秋》上为“文革”时期自己所犯“恶行”公开道歉。该文称，“时因年幼无知，受人蛊惑，又个性愚顽，善恶不辨”，参与了批斗学校领导、老师的活动，并参与到同班同学家中抄家，在居住的宿舍院内对有些家庭进行骚扰。“垂老之年沉痛反思，虽有‘文革’大环境裹挟之因，个人作恶之责，亦不可泯”，因此向当年受伤受害者道歉（参见《炎黄春秋》2013 年第 6 期，第 83 页）。2013 年 11 月，陈毅元帅之子陈小鲁公开向“文革”时期受害老师道歉的消息被许多媒体转载，他因此被称作“为文革公开道歉的‘红二代’第一人”（参见《陈小鲁的道歉，压力来自哪里》，人民网，<http://opinion.people.com.cn/n/2013/1105/c159301-23430921.html>）。同部分人以前“我绝不忏悔”的态度形成鲜明对照，上述事件说明不少人对“文革”时期的亲身经历、所作所为并没有淡忘，有时反而越来越感觉成为“压在心里的一块石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不断的反思，他们对当年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看法已经比较冷静和客观。

② 杨帆：《共和国的第三代》“内容摘要”，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第 1 页。

③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东方出版社，1996，第 125 页。

中，北京大学的印红标教授对“文革”时期青年思潮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①其目的就在于探寻那些已经淡出人们视野的“失踪者”及其走过的足迹，旨在以此揭示他们从“文革”支持者、参与者到“文革”批判者、反对者的显明转变。与印红标教授的研究形成回应的是，著名学者岳建一对此感同身受：“我们亲历‘文革’浩劫，见证中华民族精神、文化、道德、伦理、常识曾经的毁灭，旷古未有。”“日与月与，沧桑变历，我们会有直面血泪体验而又具精神深度和斑斓个性的记述文字吗？”“我们可以超越流行、通俗、统一的记忆——进而找回记忆的天性、天赋和天良吗？我们能否还原每一记忆的自由、骨血、质朴、灵性、不可替代及至高贵的精神人格吗？”^②在被称为共和国第三代人的社会群体当中，不少“文革”亲历者断然拒绝淡忘历史和扭曲真相。从学术意义上，我们有必要将他们这一代的人生轨迹放回历史现场进行深度研究。

目前关于红卫兵、知青的回忆录不断发表和出版，各地档案馆有关的档案资料也在不断放开。相对来说，目前研究“文革”及该时期青年群体的条件已有逐渐走向成熟的可能性。在此背景下，涉足“文革”史乃至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学者，恐怕不免都会发出疑问：“文革”十年，青年群体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推动这些转变的动力又是什么？

据有限的观察，学术界对“文革”时期青年群体不多的研究成果中，多数集中在红卫兵、知识青年的政治思潮与政治行为，并且主要关注他们在政治运动中的随波沉浮或逆流而动（相关研究，请参阅“学术史回顾”部分）。由此角度得出的研究结论，显然有利于更直接地回答上面提出的问题，同时对于“文革”史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但是，如果仅仅关注青年群体在“文革”时期的政治思潮与政治行为，只关注他们在十年间“台上”“台下”和“上台”“下台”乱象中的政治态度，不免给人“骨架粗具而血肉模糊”的印象。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历史本来就是一个多面体，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得到的或许只是部分的“真实”。不同角度得到的诸多“真实”，通过不断叠加与相互补充，最后才有可能引领研究者走向终极的“真实”。离开“真实”多面体的任何一个面，或者仅仅看到“真实”多面体的

① 印红标：《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

② 岳建一：《担当记忆的尊严》，《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4期。

一个面，恐怕都有可能会犯“盲人摸象”的错误。

有人称“文化大革命”其实质是“大革文化命”，有人在“文革”结束后称“文化已随革命去”。不言而喻，持此观点的人或许会赞成这样的看法：“文革”不只是一场关于政治的“革命”，而且还包含有关“文化”方面的“革命”。学术界就新文化运动与“文化大革命”关系的争论，从某种角度上是将眼光投射于二者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①从整体上说，“文革”是一场打着“文化”旗帜的“政治革命”。但是，不能否认的是，“文革”确实也充斥着与政治分不开的“文化”运动、“社会”运动。研究“文革”不能完全回避“文化”而大谈特谈“文化大革命”。“文革”前期的《二月提纲》、揪斗“三家村”“破四旧”，后期的“儒法斗争”“评《水浒》”等，虽然是以“政治”为着眼点的政治运动，却无不与“文化”有关、无不含有“文化革命”的意味。只不过，“文化”有时只是一件外衣而已。

“破四旧”运动，表面是以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树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为重点，但是这场运动没有止步于此。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在发表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中，号召全国“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创造和形成崭新的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但是，这场运动的主旨显然不仅仅在于“移风易俗”，而是将矛头对准包括意识形态、宗教、艺术、法律、政权在内的“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值得给予更多注意的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中，“最中心的

① 关于“文化大革命”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学术界基本存在“传统”与“断裂”两种观点。前一种观点认为，“文革”继承了新文化运动中激进主义的历史资源，其表现就是全盘否定传统文化与传统价值观。持此观点的学者林毓生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他认为“文革”在文化方面的激进主义可以上溯于五四运动，“这两次文化革命的特点，都是要对传统观念和传统价值采取疾恶如仇、全盘否定的立场。而且这两次革命的产生，都是基于一种相同的预设，即：如果要进行意义深远的政治和社会变革，基本前提是要先使人们的价值观和精神整体地改变。如果实现这样的革命，就必须激进地拒斥中国过去的传统主流”。毛泽东晚年发动“文革”的某些主张，可以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找到历史遗留下的影子（参见〔美〕林毓生著、穆善培译《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第2~3页）。后一种观点认为，“文革”是新文化运动的反动，“是‘五四’对立面成分的回潮”，“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反对的封建专制、愚昧迷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恶性发作”。“文革”和五四，“充其量只有某些表面上的相似，从实质上看，两者的方向完全是南辕北辙的”（参见严家炎《五四·文革·传统文化》，载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第238页）。

是政权”。“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①。

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发表的两个个月后，林彪在“8·18”大会上的讲话更加明确。他明确要求红卫兵们：

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我们要大立无产阶级的权威，要大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一句话，就是要大立毛泽东思想。我们要让亿万人民掌握毛泽东思想，让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思想阵地，用毛泽东思想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让毛泽东思想这个伟大的精神力量，变成伟大的物质力量！^②

此后不久，青年人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破四旧”“立四新”的运动，甚至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与此相关或者无关的许多生活细节。

纵观林彪在“8·18”大会上的讲话不难发现，它并非仅仅以号召红卫兵“破四旧”为重点。一方面，这篇讲话反复强调毛泽东在领导这场运动中拥有绝对的权威，这是林彪向毛泽东表达忠心的手段；另一方面，这篇讲话着重号召全国各地，“要放手发动群众，要坚决反对包办代替”。深谙中共党史的研究者不会不知道，在中国共产党多年领导群众运动的历史经验中，“放手发动群众、反对包办代替”是在“放”的阶段经常使用的重要指示。与此相反，“加强党的领导”通常是在群众运动“收”的阶段使用的重要指示。前者基本上强调党组织对群众的发动，后者基本上强调党组织对运动的约束。林彪在这一次讲话中使用“放手发动群众、反对包办代替”，或可从中推测这次“文革”的发动仍要采用“先放后收”的方式。“文革”后来的走向确可证实，这种推测应该是能站得住脚的。

“文革”的开展首先抛开了原来的党政体制，而采取了自下而上的发动手段，这是新中国成立17年以来从未公开言及、从不敢公开言及的“新鲜

①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1988年10月内部出版，第28～29页。

② 《在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上林彪同志的讲话》，1966年8月19日第2版《人民日报》。